

# 為何老台灣人缺少對日人的仇恨？

蘇仲卿

## 韓國人的疑問

爲了回顧二戰結束六十週年的歷史意義，在八月十五日本投降日的前夕，龍應台基金會邀請日本、韓國、俄羅斯、德國等國學人，與本國的學者會在台北市中山堂，舉行了軸心國所發動侵略戰爭後果的研討會。會中，韓國學人表明韓國人有全國一致對日本人的仇恨意識，但是在台灣似乎不會感受到相同的仇恨感情，他希望瞭解其理由。我是在感受性最敏銳的年代，置身於二戰與其結束直後的台灣社會中，也許對該韓國學人的疑問，可提出一些可作爲回答的體驗。

## 終戰直後「復歸祖國」熱情之急速冷卻

日本領台五十年的最後十六年多，我出生到差不多完成中等教育的時段，而其一半時間，正是中國的「八年抗戰」受難期間。雖然台灣未有過成爲陸戰戰場經驗，戰事結束前一年受到美軍的空襲轟炸，特別是最後半年的轟炸密度相當高。因此，戰爭結束給台灣人帶來的喜悅，第一，當然是不再有戰爭浩劫的歡喜，第二是日人殖民統治結束，回歸祖國的長期企盼的實現。

1945年的十月，有了大陸接管台灣的高官要到達的消息一出來，剛由日本「學徒兵」部隊復員，再開學業不久的我們，立刻請人教唱國語歌（國歌與義勇軍進行曲）、手畫製造國旗、發動全台北市的中學以上學校學生清掃轟炸之後的全市髒亂，並依照官方發佈的時間，手拿手製國旗，列隊於台北機場前大馬路兩邊，要給接管大員熱烈的歡迎。很不幸的是，等老半天也等不到人的事發生不止一次，記得是在第三次才接到。當年要到機場，大都是走路去的；一次又一次奔走的辛苦可想而知。但是，第三次接到的時候，原來興奮的心，看到站在中型吉普車上的衛兵們，老不客氣將槍口指向我們的姿勢，立刻冷卻到極點。對當年都受過軍訓的中學以上男生而言，攜帶的槍枝，雖然是空槍，都不應該指向敵人以外的人是常識。顯然，護衛長官的衛兵們將我們手拿紙製青天白日旗的學生看做敵人。

此一經驗是筆者對大陸來的帶槍者產生不信感的開始。加強此一感情的是1947年228事件的經歷與體驗（有機會改稿敘述），特別是該事件近尾聲時，大白天在台北街頭無冤無故受到手槍槍擊；因看到該人的舉槍動作而得閃避於亭子腳柱子後，槍聲的同時柱子響起子彈的反彈聲，假如不是該人騎腳踏車急疾而過而不再發射，後果將會相當可怕。

## 爲什麼老一輩的台灣人不仇恨日本人？

### 1. 日本人帶來可以安全生活的社會

一般的台灣老百姓接觸過的日本人，大都是學校的老師與警察。日本的警察，

對守法的人來說一點都不可怕。台北縣九份的我家門外設有警察的巡邏箱，每天兩次定時可以看到警察前來蓋印，其來去都很有規律與禮貌，對幼小的我，不但沒有一點壓迫感，反而有安心感。我的祖母是活過清朝、日本的明治、大正與昭和，以及民國的三個朝代，在民國四十五年以近九十歲高齡過世。由祖母的回顧談，大略可以知道清朝年代的治安不好、土匪與貪官污吏橫行、公共衛生不良、惡疫流行等情況。因此，在她的心目中，對革除了台灣社會這等弊病的日本人存有好感，應該可以瞭解。

祖母長大的農莊是大家的四合院，其建構完全是以防匪的侵襲為第一目的，備有槍枝到大砲，可以說是一座小要塞。二戰後不久，流傳辦公事也要送紅包才行得通的話。當時我聽到祖母嘆息說：「可悲，又回到“衙門八字開，無錢免來”的時代」。

## 2. 日本人老師素資好與台灣人的尊師風氣

台灣人喜愛子弟受教育及對教育事業的尊敬，可以說是一種傳統。為推動日化教育，日本人送到台灣的教師素質相當高，又在台灣建立的師範教育體制也相當成功。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好感，可以說是在教室裡建立的師生關係為基礎。以下依據個人的經驗，做進一步的說明。

日本人在台灣辦的初等教育是台日分開的。台灣子弟唸的小學叫做公學校，日人子弟就學於小學校，都是六年制。入學於公學校的日人子弟可以說絕無，但是，唸小學校的台灣子弟，雖然是少數，還是有。能入學日人小學的台灣學童，都與其家庭的背景有關。

到了中學是不分本籍，但是，大多數的公立中學，收容的學生以日人為主；假如在同一城市有一個以上中學時，才會有一個台灣子弟較多的中學出現。以 1945 年的台北市為例，男女分校的中學各有四處，其中台北二中與台北三高女的台灣子弟各約佔九成，其他只有一到二成而已。這並不是因台灣子弟不向學，或是素資不好，而完全是受歧視的結果。

我在鄉下的公學校就學。沒有多少日人的鄉下，不會有日人的小學存在。1935 年 4 月入學時，課程表上還有以台語教的「漢文」課。所以，一年級的老師是剛由師範學校畢業的台灣人。但是，漢文課上了一年就被取消，以後到畢業時的老師是兩位日本人。

較低年級的老師叫做「中野富雄」，是大分縣人。被遣回日本約二十年後，有同學去日本時與他取得聯絡，以後有將近三十年時間，與我們的同學會來往密切。我在 1980 年代被借調國科會擔任國際合作處長期間，由他引介認識大分縣選出的日本參議院議員兼自民黨科技部部長「後藤正夫」先生，與日本的科技交流的推動上，獲得非常大的幫忙。

畢業前兩年的老師是剛由長野縣過來的「小幡晃」，有二男二女的六人大家庭。1941 年中學入學考試失敗，已經放棄再考的時候，他私下替我報考剛成立的

台北四中，因而得以不中斷學業；又中學一年結束時，他轉到台北市太平公學校當教頭（教務主任），配有三間臥房的宿舍。新設的台北四中沒有學生宿舍，外縣市的學生只得自找私人寄宿。他看我寄宿在汐止坐火車通學，每天上下學都辛苦，叫我與他們家族同住，提供玄關邊的四疊半小臥房給我。一年後，小幡老師被日本軍部徵去海南島的糖廠服務，家族必要搬出學校宿舍住入小房屋時，我在小幡家的生活才結束。

我在小幡家的待遇，完全是當小孩們的大哥；日本人的家教是長幼有序，所以，我在小幡家小孩們的心目中是必要尊敬的大哥。師母的家事操作，全部自己來，我的衣服也全部替我洗，吃飯一起來，與我自己母親沒有兩樣。我在小幡老師家同住一年，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經驗。

戰後，與小幡老師取得聯絡時，已經是老師要過世不久之前。當時的國外旅行不簡單，只得以信函來往互通消息而不得再有謀面機會，非常遺憾。

### 3. 中學的入學歧視及低能兒日本人同學的歧視

進入中學以後，才是與同年齡的日本人相處的開始，也是領教一些日本人同學不當歧視的開始。台北四中的台灣人學生比率約佔兩成。因為入學名額受限制的關係，被錄取的素質當然比日本學生的平均好，所以，其學業成績都在前面三分之一以內。這一事實表示老師的評分沒有歧視。學業好的日本人學生，都能表現大家平等的風度，要不得的是，因為具有日本人身份才得入學的「低能兒」所表現非常幼稚的歧視言動。似乎腦筋不發達者四肢發達的趨勢，在這一類低能兒容易呈現，所以常見幼稚言動與暴力同時出現於身邊。

### 結語

雖然有制度上的不公平及一部份有不當優越感日人的歧視，日人在台灣所做近代化建設及所帶來的安全且穩定的社會生活，與光復後的社會動亂及白色恐怖構成的強烈對比，才是沖淡了一般台灣人對日本人仇恨記憶的主要原因。當然，日治時代最後幾年的台灣初等教育普及到六年義務教育，因而普遍構成了濃厚的師生感情網路，發生了很大親日本人社會意識的作用。就以我個人的體驗來說，小中大學階段所接觸過的日本人老師無一不所懷念；加上尊敬老師的家教深厚，叫我對日人老師們產生敵意是不可能的任務。(2005/08/18)